

# 凸显元代中期诗文独特价值的一部力作

——读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

黄二宁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对元代诗文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在唐宋、明清之间,元代文学的整体价值往往被低估。其次是受白话文学史观的影响,学界更侧重对元杂剧、散曲等俗文学的研究。再次,在对元代诗文的研究中,学界往往又侧重宋元之际、元明之际的研究。于是,元代中期诗文便成为一个被忽略的领域。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造成了我们对元代诗文创作的认识盲区,更限制了对元代诗文成就作出正确评价。

陈垣高度评价元代的文化成就,认为元代“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sup>①</sup>。从元代文学的创作实际来看,诗文依然为大宗。学术研究贵在求得真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全元文》(李修生主编)、《元代别集丛刊》(李军主编)、《全元诗》(杨镰编)等元代诗文文献的全面整理与出版,元代诗文研究的文献基础已经完备。近年来,李修生反复呼吁元代文学研究要打破前人成见,重建研究构架和体系,重建元代文学史<sup>②</sup>,引起了元代文学研究界的共鸣。时代呼唤着元代文学研究者对此作出回应。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sup>③</sup>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应时而出,填补了元代中期诗文研究的空白,是一部凸显元代中期诗文独特价值的力作。

该著分为上、下编,上编探讨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艺复古思潮及诗文创作实践,下编探讨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多民族特征与元中期文坛的南北融合。全书紧密结合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与南北文化融合两大时代特征,对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的互动关系作了深入、全面而富有创见的探讨。该书是第一本全面探讨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关系的专著,纠正了学界以往对元代诗文的诸多刻板印象(如认为元代诗文成就不高),深化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元代中期诗文创作特征、南北文化融合背景下的文学新变等),更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独具元代时代特征的诗文创作问题(如“北人作南风”“南人作北风”等),从而在总体上

①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② 《关于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即是李修生最近关于重建元代文学史问题的一次集中阐发。详见李修生《关于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文史知识》2014年12月。

③ 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下文所引该著原文仅随文标注页码,不再另注。

凸显了元代中期诗文的独特价值。笔者以为,该著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通观性的研究视野下重新评估元代诗文价值。该著对以虞集、马祖常、揭傒斯、黄潜、柳贯、欧阳玄、柯九思、苏天爵等为代表的奎章阁文人群体核心成员的文艺复古思想、士人交游网络与诗文创作实践等进行分析,以史的眼光前后联系,将与该群体文人关系密切的程钜夫、赵孟頫、杨维桢、萨都刺等纳入研究视野,贯穿起元代诗文发展的内在线索与脉络,将元代诗文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相当广阔的研究视野与统揽全局的通观眼光。

通观性的眼光不仅局限于元代之内,更体现在将元代中期诗文放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中重新评估其价值。比如书中对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分析,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层,注意到了诗中强烈的异地乡愁特征,并将其分为政治乡愁、文化乡愁、地理乡愁三个层面,使人读之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作者将上京纪行诗歌放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中,重新评估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认为上京纪行诗强烈地体现了“南人作北风”的气质,反映出元诗创作的主要特征。“那种由疆域之广而激起的自豪感、由异域风情之胜而滋生的熏染陶醉感以及由生于其中却不能融为一体的异质乡愁情绪,是唐代边塞诗略有触及却远未展开的,它比唐代边塞诗表现得更开阔、广远,甚至更深刻。”(第 370 页)书中还对上京纪行诗改变宋季诗风、吟咏风物与意象上的贡献与创新“工拙互见”中的诗体革新意义等进行了阐述。可以说,这些分析与论断将重新定义学界对元代诗文的认识与评价,对于重建元代文学史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紧密结合士人成长环境,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将元代中期文学放在元代南北一统以后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与文化背景下进行观察,体现了时代思潮——主体交游——创作融合的研究思路,形成了历史、文化、文学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

书中指出,奎章阁文人群体出生在元朝南北统一前后,亲身经历了国家由草莽粗创到制度渐兴、趋于成熟的过程,是国家教育、科举等文治方略逐一完善进程中最直接的受益群体。因此,他们“对于大元王朝地分南北,横跨中西,具有多地域、多气候条件、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的特征,有充分的认知和切身的体验。”(第 381 页)基于此,作者紧紧围绕元代的时代特征、社会思潮、士人心态展开相关论述。比如作者指出,“探究元代诗歌创作,尤其是奎章阁文人引领的元代中期文学创作,需要深深理解那个时代人们观国之光、遍历江南之丽,海涵四境,声披宇内、域外的心态。”(第 13 页)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时代心理作用下,作者强调,元代诗文的特殊之处不再是传统的言志抒情,“而是态度熙和、表意稳妥、描述切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写作目的上与上古诗歌创作的意义相近,具有可以群、可以观、可以兴的特点,真正迎合了那个时代多民族、多政体、多地域、多风俗情形下大家渴求交流、联系、共鸣的需要。”(第 13 页)这一段话对元代诗文独特价值的揭示显豁醒目,更将其与“诗可以群”“诗可以观”的诗学传统相联系,掷地有声。

第三,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关注元代文坛的多民族共存现实,以群体、族群、个人三位一体

的关照角度,深入分析南北文化融合之下的文学新变。作者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讨论元代南北文学的融合问题,并首次提炼出“北人作南风”和“南人作北风”两个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显示出作者的学术洞察力与理论概括力。

作者认为,“北人作南风”现象“是指在元王朝四海一统、南北混融、舟车不限的时代大背景下,北人受南方文化影响,在创作中或运用南方典型创作手法进行写作、或以南方风物为描摹对象、或以南方时调写北边风情,其间又不失北人气质,显示出南北贯通,不拘南、北地域之限的风格。”(第199页)而“南人作北风”现象“是指元王朝海内一统,逐渐向南方敞开怀抱之后,南方文人大举北上,为北方气度、景物、人物风俗、异域宗教等所吸引,所作诗文既溢出南方典型意象,又脱略于南方农耕文明的特征,显示出迥异于南方文化气质的创作现象。”(第199页)作者将以北方上都为主题的“上京纪行”和以南方江南意象为主题的“江南书写”作为元代中期南北文坛融合的象征话题。这种提纲挈领的论述,具有纲举目张的效果,对我们认识元代诗文的独特价值及南北文学的双向影响极具启发意义。

此外,作者的论述始终从文化的双向影响入手,“一方面是北人为南方精致文化所吸引,不断学习、不断调整自身文化气质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被征服的南方为北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恢弘气魄所慑服,不断修整自身文化气质,寻求被接纳、被整合、被融入的过程。”(第199页)这就跳出了汉化、华化这样的文化预设与研究框架,体现出研究立场的公正性与超越性。

任何一种学术探索必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书中论及某些问题的还可继续讨论。比如书中将南北方文化的差异直接对应为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似乎过于绝对化。而古典文学中一些共同的诗歌写作方法,如用典故、用史事,似乎也不能过于坐实地归功于“南方文化”。书中数次以马祖常作为“北人作南风”现象的典型代表,这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将马祖常《龙虎台应制》诗的对仗工稳、用典精切完全归于南方文化,就显得牵强而难以令读者信服。还有,书中在论述宋、元文风之变时,将谢枋得《上程雪楼御史书》作为南方文风之弊的代表作,认为其“议论胜而文章卑”“有浮华过实之弊”(第208页);同时将程钜夫的奏疏《好人》《学校》等作为“在新王朝弘扬的新风格”(第211页)的代表作,与谢书进行比较。将遗民上书与附臣奏疏相提并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书信与奏疏两种文体的不同言说主体、言说对象和话语方式的区别,将缺乏可比性的二者进行对比,因此也就难以对文章论点形成有力的论证。但是,瑕不掩瑜。整体上看,《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元代中期诗文的独特价值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重建元代文学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黄二宁,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刚】